

中评周刊



CHINA-REVIEW WEEKLY

2019「新年期许」特刊 | 2019年2月23日

《中评周刊》编辑部全体 **感谢每一位作者和读者，愿您新春阖家安康吉祥！**

中评周刊 | 2019「新年期许」特刊 目录

1. **李楯**: 中美日合作, 向前看 P. 2
2. **蒋豪**: 我的新年期许: 重建“共和”信念 P. 6
3. **梁治平**: 重温改革精神 P. 10
4. **吴思**: 缩小知行剪刀差 | 我的 2019 新年期待 P. 15
5. **许章润**: 这个时代如何驯化统治者|浅议用两张“票子”取代两根“杆子” P. 19
6. **盛洪**: 我的新年期许 —— 回归古典文明 P. 24
7. **张曙光**: 法治乃立国之基, 诚信乃做人之本 | 从“千亿元矿权之争”谈起 P. 26

预告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P. 34

订阅 | **往期下载** P. 37

李楯：中美日合作，向前看

[李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李楯教授

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赞同。但只说不做，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的说法相矛盾，或说与做不一致，也不好。

历史的纠葛、旧账的处置，是第二位的，人权保障，人民的福祉，人类发展是第一位的。

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利益、主张有不同。面对利益、主张不同，或者利益、主张冲突，是暴力相加，你死我活，还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对话、谈判，立意和平，着眼合作、发展。我赞同后一种方法，对国内、国外，都是如此。

中国至今不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搞好，应该检讨。

大致在 1860 年以后，中国具备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质。后来，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党在

国上”。1928年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领域，建立党治政体，经济、社会、文化，仍处开放世界之中。1950年后，中国大陆开始走向封闭，于封闭之中，经超强力社会整合，建立了独特的——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文明质态，即党治国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中，行进至1969年。1970年代初，情势改变，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国门逐渐打开，终至提出“开放”，行进至半开放的状态（一些想重新封闭的主张和做法也不时出现）。邓第一次复出，万里整顿铁路，农村从大寨式记工改回工分制等，至1979年，改革之势遂成；经过探寻第三条道路和在党领导下采用市场的方法去实现经济增长的两轮改革后，既有的深层制度化结构终使中国大陆经由“与世界接轨”的时段，进入了“中国特色”的时段。



1979年1月，**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之邀访美，同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恢复邦交，访美期间，美国主要电视网的黄金时段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有“人治与法治”之争。其实，中国问题，在“党治”与“法治”的发展路径选择。上世纪50年代的手工业、工商业改造与今天的发展民营经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强制“只生一个”与今天的放开二胎，是当时、现在都对，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以至土地改革，是非用革命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政治的方式，还是用法律的、经济的方式即可，更是一个应该检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法院改判案件一百余万起，还不算以其他方式平反的冤假错案。

改正错划右派50余万，改原定资本家为小业主、独立劳动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70万。这些，能认为在当初划定时也是对的吗？

另，摘掉地、富、反、坏帽子 600 余万。

以上各类，连带家属，当是多少人？遑论文革伤人更多。

城乡分治的制度设置，在上世纪 60 年代曾使数千万人死于饥馑，至今仍使国民中的多数因并非自己的原因处贫困和低收入状态；社会的不公正，造成了人们在拥有财富和资源上的过大差距。

今天，提这些，不是为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而是为搞清楚事实真相，寻求能使整个社会通过和解向前看的可能。

要消除那种强迫症般的敌情意识，及自己的事没办好，皆因有他人阴谋的不当思维方式。认可别人可以和自己不同。要确立一种良好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准则，认可、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国内，施行宪政，遵循法治和善治的原则行事。在国际上，与美日这样的国家建立真心实意的合作关系，共同面对人类的难题。



1909 年，庚子赔款第一期赴美的小留学生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近代以来，美国在中国可以有势力范围，甚至是殖民地，美国没有要。美国退回庚款的一半用于支持中国学生赴美读书。美国的民间机构和教会在中国创办了协和、华西、燕京、金陵、岭南等大学和医院。美国人先以民间的形式，后由国家跟进，支持了中国人的对日抗战。以至上世纪 50 年代初，必须下大力，以一系列的运动来改变在中国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国民中的亲美、反苏等观念和主张。终于，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下，在信息的取得和发布都处管制的情境下，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美国成了头号敌人，中国人所有愿望的不能实现，都来自美国的阻挠和破坏，一切发展中的阻碍，都源于美国的阴谋。

我认同中国的开放首先是对美国的开放，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支持和与美国的合作。

中国如果要消灭私有制，当然无法和美国深入、持续合作。但中国如要保障人权，提升人民的福祉，使国家走向发达，则只有和美国合作。

日本和俄国（包括苏联时期），近代以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犯有罪行——但不应忘记：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在带领东方抵制西方的旗帜下进行的，所谓“东亚共荣”，即此。在一个所谓“好”的目标下，能够烧杀抢掠，是我们应汲取教训的。

二战后的日本，制度结构已变，且已进入发达行列，再无“复活军国主义”可能。相反，主张“先军政治”，天天喊打仗，不顾自己人民生死的主张，倒是值得警惕的。

俄国政府，占据了曾是中国的大面积领土；至今，对中国，唯利是图。朝鲜党，从不真心以中国为友，且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印度，与中国芥蒂犹深，暂难有深入的合作。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自身即不稳定的政府，对外朝秦暮楚，只是要钱，不可能和中国有稳固的，可使中国人信赖的关系。

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改善，首先要靠中国人自己，即要靠中国人下大力气去搞好自己的事。对外战略的选择，应是基于为搞好中国人自己的事而做出的。

由此，我认为：把人放在第一位，以中国大陆进入发达行列为目标，对内，修复人心，修复社会，修复生态，改变“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结构，保障人权，实施宪政；对外，与美日等国合作，遵从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尽可能地协调相互间的利益——这，就是我在新的一年来临时的期许。

[【返回目录】](#)

蒋豪：我的新年期许：重建“共和”信念

[蒋豪 法律、经济学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及公共治理中心主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蒋豪

图片来源：中评网

曾经，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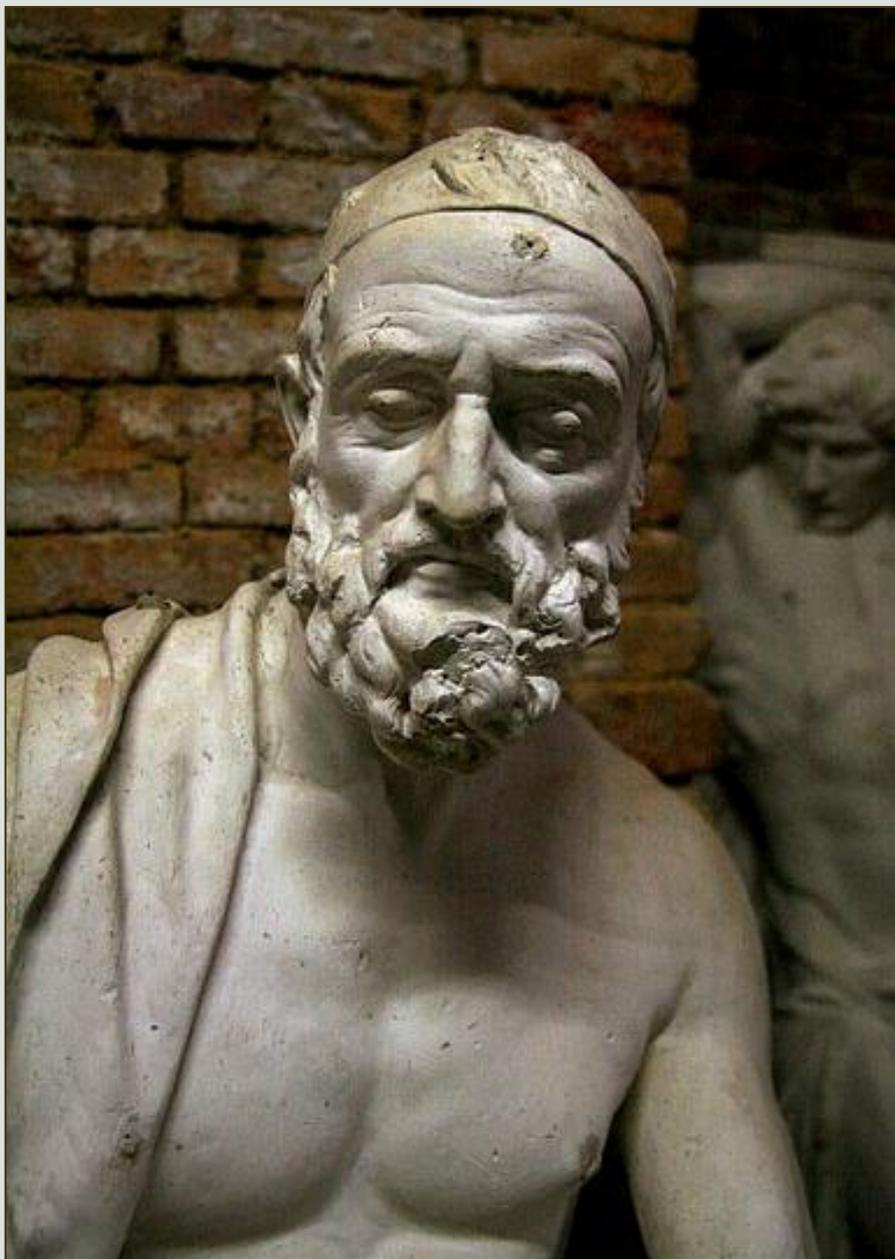
今天，“共和国”这几个字仍不时挂在我们的嘴边，小学生们都很熟悉。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准确说出“共和”的涵义？又有多数人知道其含义的同时也愿意践行其意义？

国人当下对这两个字可能比开始引入这两个字时更加陌生。

共和的拉丁语为“res publica”，对应的英文为“public thing”，意为“公众事务”，指不同的主体，尤其是不同政治主体的和谐共处，共同处理公共问题。“共和”这两个汉字的翻译可谓贴切传神。就该词的词源来说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但是就追求政体的稳定和谐、保障公民自由的内容而言，则至少可追溯到近 3000 年前。

在人类的实践和思想发展史中，开始是实践走在理论之前。2800 多年前吕库古在斯巴达，2600 多年前梭伦在雅典，2500 多年前罗慕洛在罗马，先后进行“混合宪政”实践，他们的后继者们在各自国家也进行了不少改革。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西塞罗等对混合宪政的理论进行分析阐述，并进一步指导实践。这种融合了国王（行政机构）、贵族（元老院，立法机构）、普通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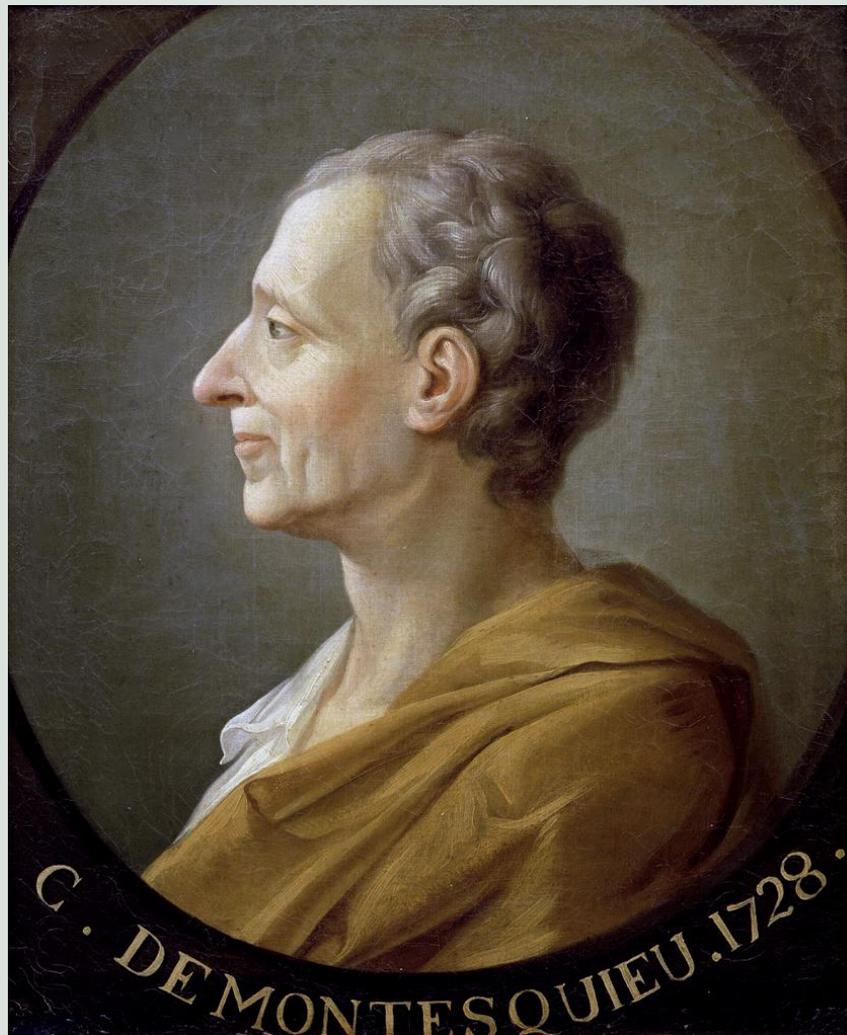
(权力机构, 司法机构)的混合宪政是现代共和宪政的前身。它有助于实现各个阶层的诉求, 保障国家的稳定。在现代分权制度出现之前, “混合宪政” 被普遍认为是比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优越的政体。



波里比阿 [Polybius 生于公元前三世纪末,82岁时因坠马离世] 塑像局部
古希腊史学家, 他亲历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和罗马帝国的崛起,
其代表作《历史》、《罗马帝国的崛起》迄今仍为经世名著

波里比阿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中早已指出, 制度就是力量, 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 而最有力量的政体就是共和制。古罗马的强大, 在于其是古代世界最稳定的、并成长为最大的共和国。实际上, 古罗马并非只有共和国时期是“共和的”, 罗马共和国之前的王政时期, 及其后的帝国时期仍然具有一些共和因素。王政时期, 国王是人民和元老院选择、任命的, 严格说来也并无家族世袭,

不同于一般的世袭王国。罗马帝国的名称实际是“元老院及罗马人民”，在形式上而且一定程度在实际仍然保留一些共和因素。然而，古典时期的共和国毕竟脱胎于城邦国家，制度格局毕竟狭小，虽采取帝国形式扩充了“内存”，罗马还是终因小马拉不了大车而散架。



孟德斯鸠 [1689.1.18—1755.2.10]

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生于法国波尔多地区拉布雷德庄园的贵族家庭，1716年袭男爵封号，曾任律师、波尔多议会议长、波尔多法院庭长；1748年以27年时光著述出版《论法的精神》，他的专制政体概念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也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描述

英国革命时期，国王与议会分裂，导致“混合宪政”实践过渡为“分权制衡”实践。英国的改革家对此进行了探索。英国的君主立宪只是古老的共和政体的一种变体，不过演变的虚君共和成为现代宪政的起源。经孟德斯鸠在理论上进行概括总结，“三权分立”理论遂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各国宪政改革的指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革命后的建政即以此为经纬建立共和国，竟使之成为百年来最强大的国家，被誉为“新罗马”。采取了分权新架构的联邦共和国，完全不同于“混合宪政”结构的城邦共和国，理论上适合于任何大小的国家，麦迪逊甚至说更适合于美国这样的大国。共和也从不同阶

层为主的共和，转化为不同机构职能为主的共和——机构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制衡。公民个人的身份则更加独立、自由。精英和大众的合作与制衡也主要表现为机构之间的平衡。

一国国民的幸福并不依赖于国家的强大，瑞士、卢森堡等小国即是明证。国民的幸福只与该国的共和宪政程度有关。国家的强大只是国民富裕之后的副产品，并由于巨国效应而放大。这就意味着——同时也被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家富强的最终原因就是共和宪政。

在号称“共和国”的国家，除领导人有任期制的限制外，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必然是分立的，即使只是表面形式如此。共和体制确立之后，国民并非应该像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所说的仅仅投身于经商的自由，不再像古典共和时代那样积极从事公众事务；而是要像杰弗逊所言，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让自由得以维系。当然，除了直选和参与当地社区的民主活动外，当今公民主要通过代议制行使自己的主权和参与权利。

中国不仅国名包含“共和”两字，宪法也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同时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文明需要我们的这个共和政体发挥其具有的潜力。

然而宪法的规定却不易落到实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或主人翁精神在当前十分必要。在各方推动下，2018年的修宪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合宪性审查和法律审查工作；同时增加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这些规定有益于中国从人治向法治和宪政过渡。但是，这一过程仍有艰辛的路要走，需要精英和大众践行共和精神，不断付出智慧和勇气。

如果我们每个人不为共和而努力，不置身于公众事务，对于所有不义之事漠然视之，那么我们就不能配称为共和国公民，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只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美梦。

公众事务的失败，其不幸结果将由所有的人来承受。❄

[【返回目录】](#)

梁治平：重温改革精神

[**梁治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曾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梁治平**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日前参加了一个以“改革开放史”为主题的论坛。“论坛”聚焦于经济、法律、改革开放史研究三大领域，共有报告 12 篇，且报告人，也包括评论人，均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深度参与者，故“论坛”不但内容丰富，也启人深思。会议结束前，主持人让我做总结发言，我整理当日印象，用三个主题词来串联我在会上听到的各种议论与关切，同时就“改革开放”这个大题目略陈己见。这三个主题词是：公私，法治，解放。

法学家江平先生以“锁住公权，保护私权”为题，回顾了过去 40 年通过法律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历程。这一叙述的规范性意味显而易见，不过与此同时，公权与私权相互关系的变化，也不失为观察和描述这一时期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一个角度。进而言之，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未尝不可以从公、私关系及其变化的方面来认识。如经济论域里的核心概念“市场”，社会论域里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政治和法律论域中的“个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公、私关系中私的方面，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私与公的关系，而改革开放至今最引人注目也最意味深长的变化，概括地讲，就发生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前者代表公和公权，后者则由个人、家庭、市场等私的要素构成。至于这种变化的大方向和趋势，套用一句经常被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说法，便是“国退民进”。所谓“国退”，是说改革开放前的全能国家变身为有限政府；政治统帅一切变成党政分离、政企分开，即承认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性质与功能不同，各有其自主性；最后则是承认人民的私欲有其正当性，尊重个人的追求与表达，从而为私权与私域的生长留出空间。“民进”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生活成为可能，家庭归于正常，市场日渐壮大，社会恢复生机。与之相伴的，是权利意识的觉醒，私权保障的制度化，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规范公权的主张。“锁住公权，保护私权”，此之谓也。

然而，“国退民进”又不能简单地说是“公退私进”。公私关系其实比上面讲的更复杂。事实上，公、私各有其正当性。私权需要保护，也需要规范；公权需要限制，也需要维护。而且，私权的保护需要公权来实现，现实中若出现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紧张，也并不总是公权无理，私权当行。当日会上有听众就此提问，并举出生活中应以公权限制和规范私权的具体事例。循此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以公权平衡私益、维护公益的微观事例，而此类工作，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实属必须。问题是，在上述语境中，无论是主张“锁住公权，保护私权”，还是主张通过公权规范私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都是在对立的系统中看公与私，进而基于不同的考量主张公权或私权的优先性。但这只是公、私关系的一个面向，公、私关系还有另一个面向，这个面向超出了前者，涉及对前一种公、私关系的重新界定。这个面向，简单说便是，公出于私，乃是天下诸私的集合与转化，而公权之尊，也非因其系于国家、政府，而是因为它能尊重和保障作为公之来源的天下诸私。就此而言，承认、尊重和保护私权，不但是公权的重要职能，也是其正当性所在。

关于这一点，古人的说法是“天下为公”。所谓“天下为公”，直接的意思就是政权属公，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君天下者”便不能以其个人私欲、私意掺杂其间，而是“以天下之心为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进而“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语出唐人陆贽）换句话说，作为统治者的“君天下者”不能有个人的好恶，万民却可以有，不但可以有，还应当被统治者满足。统治者以万民的欲念为自己的欲念，天下为公就实现了，统治的正当性也因此得以确立。时下流行的政治话语，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等，显然也是出于“天下为公”的思想传统。只不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天下为公”的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其中就包括用“主权在民”理论替代“民贵君轻”的说法，以权利话语取代道德话语。要让“君天下者”以“天下之心为心”，重点也不再是“正君心”，而是实行“民主与法治”，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这个笼子是由宪法和法律铸成的。于是，国家治理的方式也由传统的“治法”和“治人”变成现代的“法治”。

把“法治”列为“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可以说十分恰当。建设“民主与法制”，是“改革开放”伊始就确立的目标。当时强调民主，针对的是文革中盛行的“个人迷信、家长制”和“权力过分集中”；

讲法制，则是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语）数十年后，法律方面的变化，除了有更多的法律、更多的法官、更多的诉讼和更多的律师之外，“法治”观念也普及于社会，甚而进入官方主流话语。然则，何谓法治？曾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制度和制定《证券法》、也是那日“论坛”报告人之一的高西庆先生的一个说法：“可预测性”，虽然不能算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点出了法治最重要的一项功能。邓小平说要让国家大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甚至，古人讲“治法”，也是要解决个人恣意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所以，古人用“公”和“信”来定法的性质：“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其中隐含的前提是，法律具有权威性。法律一经制定颁行，所有个人、组织都要受其约束。这既是古人的理想，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义。只不过，现代社会的生活样态远较古时复杂、多样，因此，人们对法律的倚重更甚，对法治的要求也更迫切。



邓小平，改变了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法律发展速度惊人，成绩显明，但距离实现法治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当日也有报告人以生动案例说明，比较立法方面的发展，执法上的差距巨大，有的地方几乎与无法同。其实，不谈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个案，只要看看频发的政府公信力危机事件，看看有如惊弓之鸟的民营企业家对随便一个什么人的“民营经济退场”言论的集体性过敏反应，看看一波又一波逃离这个国家的移民潮，你就可以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可预测性”是多么低，知道作为天下共信之物的“法”在这个社会中的份量有多轻。

我用作总结的最后一个主题词是“解放”，这也是这个以“改革开放史研究”命名的“论坛”上

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词。“论坛”报告人频频使用的另一些词汇，如“松绑”“解禁”“解密”等，也与“解放”有关。这一点也不奇怪。“改革”开放始于一场思想运动，即“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如此，整个“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解放”运动。“开放”本身的解放性自不待言，“改革”的目标也是“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心灵，解放想象力，解放社会，解放生产力，释放创造力。“解放”的反面是“禁锢”“限制”“封闭”和“不自由”，因此，“解放”就意味着去除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打破种种思想、言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禁区，一句话，就是还人民以自由。中国社会所以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所以有今天，其源头在此。



尽管“解放”主题贯穿“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我当日发言的重点却落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上，这不只是因为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史研究”，几位报告人如章百家、沈志华、萧冬连等对此议题均有深入讨论，且思想学术领域与“解放”议题的相关性最直接，对禁锢与限制也最敏感，更是因为这个议题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沈志华的发言提到时下的两个热词：“智库”和“话语权”，他认为这二者都很重要，但必须同“宣传”区分开来。因为“智库”的价值在于能够提供独立、客观的知识和意见，“话语权”的确立则要有能够服人的权威性，这两样东西都无法由“宣传”获得，却可能因为被混同于“宣传”而受害。这种区分涉及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地位和功用的认识。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是我们时代的大问题，但这也是人们常常自以为了解而实际并不真正了解的问题。运用国家强制力对“意识形态阵地”“严防死守”就是这方面的明显证据。这样说的理由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在政治上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在硬的国家机器及其强制手段之外，提供一套关乎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和说辞，这套理论的说服力越强，它被接受的范围就越大，程度就越深，距离硬的国家机器就越远，建立在这套理论和说辞之上的政权也就越是稳固。相反，一旦这套理论和说辞要靠各

各式各样的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它就不再能够有效发挥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甚至干脆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成为硬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国家是脆弱的，因为其统治成本高昂，其中就包括以强制手段维持所谓“意识形态”的成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权有多重要，而保持思想学术领域的“解放”对于建构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又有多重要。说到底，只有在人们拥有或自以为拥有自由表达和自主选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才能够存在并发挥其作用。

“解放”的题旨还可以从另外两个主题词上去理解。如果公是诸私的集合与转化，如果“为人民服务”最后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公的察知和实现就必须以诸私的自由表达为前提。相反，在禁锢人民思想和处处限制民众表达的制度下，国家声称所代表的“公”总是令人怀疑的，也很难得到人民的信任。实行民主和法治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民主意味着参与范围的扩大，法治意味着某种自由秩序的实现。它们都属于“解放”的制度形式。通过对这三个主题词相互关系的思考，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精神应当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

最后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谈论历史？回答很简单：历史是理解现实的重要途径，因此，谈历史便成为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萧冬连先生在发言中说，只有先了解“文革”，才能理解“改革开放”。循此思路向前追溯，会把我们带入一种严肃且意义重大的历史思考。不过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如果我们认为“文革”是一个悲剧，一场劫难，绝不容许其重演，那么，除了去探究“文革”的起源、发展、结果和机制，我们还要认真研究作为其反动的改革开放史，了解最初启动“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的初衷，包括邓小平那一代共产党人否定“文革”的共识，以及他们基于这一共识和民心民意而提出的改革方案。事实上，中国社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仅就国家大政方针而言，正是沿着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确立的方向努力的结果。这个方向，用我在前述总结发言里的话说就是：确立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公”，推动民主与法治，和以还人民自由为特征的“解放”。中国人在过去40年创造和积累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社会资本，皆因为这一历史性转变才成为可能。

诚然，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们的，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只有通过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继续向前面描述的大方向努力，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停滞不前将错失机遇，最终积重难返；否定“改革开放”，扭转过去40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将没有未来。这是我们从改革开放史以及造就我们时代的改革开放前史中得出的最大经验教训。 ■

[【返回目录】](#)

吴思：缩小知行剪刀差 | 我的 2019 新年期待

[吴思 著名历史学者、作家、记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吴思

2018 年初，我在天则所新年期许座谈会上提了六点期待。一年过去，到底实现了多少？我先回顾和评论几句。然后，根据最近几年的大走势，我再提出一个大期待：缩小知行剪刀差。

一，回顾去年的新年期待

2018 年，我的新年期待好像实现了两条。

第一点，我希望市场经济的自由度能提高几分，例如从 52 分提高到 54 分。只要降降税，产权保护程度提高一点，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多一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一点，市场经济的纯度就会有相应提高。

我的愿望部分实现了。增值税税率降了。集体用地进入市场开始试点了。民企产权保护的承诺更多了。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 2018 年 2 月发布的评估报告上，我发现，中国经济的自由度，从 2016 年的 52 分跃升到 2017 年的 57 分。虽然，50-60 分仍然属于自由受到严重压抑的经济，但

是能冲出十年徘徊，提高 5 分，还是让人眼睛一亮。我不知道 2018 年的状况如何，是进是退，但我这项具体愿望确实没有落空。

肯定会有人质疑我的结论。例如，税率在名义上降了，但“金税三期”大幅度提高了征税技术，企业实际上交了更多的税。再加上社保金由税务部门征收，企业负担不降反升。这些质疑当然有理，但一码归一码，名义税率降了就是降了，文件上的进步也是进步。综合效果不佳，落实跟不上，再说综合落实的事。

肯定也有人想讨论进步的原因，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看主动说和被动说都有理，形势比人强，关键是结果如何。

第二点，我希望意识形态向邓小平的政策靠拢，减少红色话语。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最高领导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共产主义”一次也没有出现。这正是邓小平刻意推迟到十几代、几十代人之后的不急之务。在这个讲话中提到的“不忘初心”，在 20 多天前纪念刘少奇诞辰的讲话中还被定义为共产主义理想，也被重新定义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再考虑到对民营企业的高调肯定，或许，意识形态回调开始了？

一定会有人反驳我，说意识形态和网络管理更紧了。确实如此。但一码归一码，红色话语减少本身也是进步。

2018 年，我的六点期待有两点没有实现。

第一点，我希望不继续打压公民社会，例如让天则所能够正常运作，有一个稳定办公场所。结果，天则所的办公室被封门了，天则咨询有限公司的执照也被吊销了。

第二点，我希望建立制度化的反腐机制，比如说领导带头，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这一步尚未走出来。制度性建设跟不上，反腐败的成果难以长久留存。

另外有两点期待，我不敢说实现了，也不敢说没有实现。

第一点在司法领域。十八大承诺司法文书上网公开，我希望公开率能比过去提高一些。各大区建立的巡回法庭，我希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渐形成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与地方法院竞争，增加民众的选项。在这些领域里，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了？我说不清楚，需要中立公正的专业人员调查评估。

第二点涉及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法工委承诺，对合宪性审查申请，争取做到条条有回复。据我所知，江平和盛洪等六位老师提出的申请，也就是审查北京市驱赶低端人口和拆除天际线是否合宪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复。个别案例当然不能代表全部，但整体状况如何？恐怕只有人大法工委才能说明白。

为了解决说不清楚的问题，我想再强调一遍去年落空的两点期待。

第一，扩大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至少不继续压缩。天则所很愿意组织中立公正的专业人员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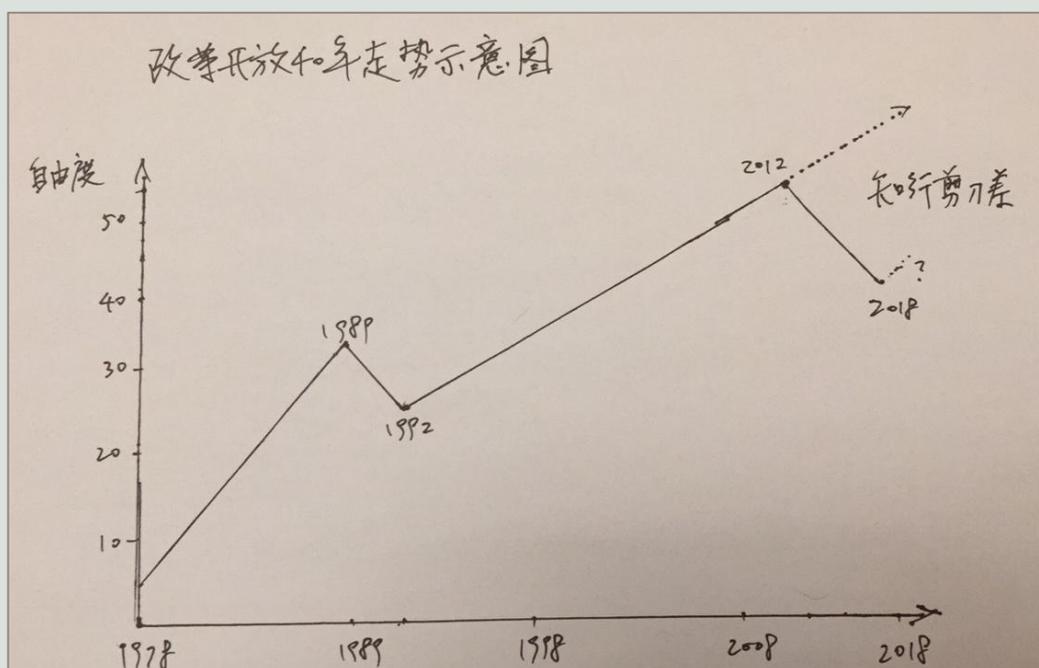
司法领域的改革进程，追踪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的落实情况，但我们遇到的麻烦多，办不成。

第二，官方承诺做到的事，例如对合宪性审查申请作出回复，如果不愿意让公民组织评估兑现程度，至少要自己定期回顾，善始善终。

二，近年的大走势和今年的大期待

五六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开出了一份改革清单，涉及六十个领域，细化为四百多个改革点。社会各界对不同的改革点的评价不同，但对大走向总体是赞赏的。这个大走向就是提高市场自由度，提高依法治国的水平。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走势，在我的想象里，呈现为一个向右上方倾斜的 M 形，两上两下。最近几年，在自由度方面，总体是往下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来承诺了上行，2012年之后应该持续向上，总体更加宽松，实际上总体下行，呈现出一个知行剪刀差，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条原因。

第一条原因：改革尚在半途，主导规则左右冲突。

我们从一元化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走来，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方向走去。那么，贯穿全社会的主导规则，到底是一元化的权力命令，还是多元化的平等契约？三中全会决议，既要强化平等契约，又要坚持一元化领导，这种顶层设计，包含了主导规则的冲突。

第二条原因：一级趋势与二级趋势冲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级趋势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两级分化，二是腐败。两级分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腐败则是非法的权钱交易。

胡温时代建立并扩大社保体系，取消农业税，努力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本届领导班子努力解决腐败问题。

反腐败是对改革开放的副作用的补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正当的。但是，反腐败运动本身也有副作用。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自由的价格提高了。

中国改革从极权社会启程，现在走到了半极权半威权的位置。一路走来，民间的经济自由一直处于稀缺状态。中共中央承诺改革开放，这是大方向，但具体在各个领域的突破，难免需要私下交易。行贿就是一种交易。在这个意义上，行贿，就是民众和资本向权力赎买自由。这是一种权钱交易的黑市。更进一步，资本还会以行贿的方式购买政治保护，甚至购买特权。这种交易导致了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蔓延。

反腐败为民众出了一口气，降低了民变风险，但也提高了黑市上的自由的价格。同时，反腐败导致官员普遍不作为。在权力要素特别重要的中国，作为全要素组合者，超级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失去了改革主动性，自由的主动供应就减少了。

总之，高强度的反腐、唱红、打右，导致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自由的黑市价格提高。为了扭转腐败、两极分化等二级趋势，抑制了提高市场经济纯度和依法治国水平之类的一级趋势，下行态势由此形成。

第三条原因：各级官员的选择性执行。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体现的顶层设计中，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两边的话都要说到，已经埋下了内在冲突的伏笔。

在执行过程中，各级官员趋利避害，是有选择性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动权力的奶酪，在反腐高压下风险很大，于是改革推进乏力。反过来，追随表现强劲的二级趋势，投上所好，弊少利多。

意识到知行剪刀差的存在，对我来说，只是不久前的事情。例如，看清反腐败运动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我这个知识不足且见事颇迟的人来说，只有当事后诸葛亮的可能。不过，一旦认清了知行剪刀差出现的原因，知行合一就是可以期待的，主动调整就是可能的。主动调整是风险最小的调整。

2019年，我的大希望是：缩小知行剪刀差，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回归改革开放的一级趋势。形势比人强，我认为这个希望实现的概率大于60%。 🍷

2019年1月25日

[【返回目录】](#)

许章润：这个时代如何驯化统治者 | 浅议用两张“票子”取代两根“杆子”

[许章润 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许章润教授

曾几何时，“枪杆子”与“笔杆子”蔚为通说，横行天下。与前者联袂而来的义项多半是“刀把子”，而有“枪杆子刀把子”的连称，刀光剑影，血腥腾漫。牵连浮现于后者的，不知为何，则为“杀人不用刀”的幽黯训诫，以及“无耻文人”、“舞文弄墨”与“指鹿为马”等一己心理，胡思乱想，秋水流转春山。究其实，正在于钳口噤声，愚弱心智，操控心灵，而以一己心思总揽万众心事，期期于塑造“新人”。回瞰现代进程，一切指向“解放”而非“自由”的革命，自巴黎风吹雷动，到斯拉夫尸山血海，再到华夏大地之血雨腥风，最终却都指向落定于极权，其因缘在此，而不止于此。

四十年前，一个初秋暝朦的清晨，在下灰头土脸，不明所以，第一次离家远行，入读政法学院。祖国天空骄阳，异乡脚下黄土，畸零人，饥肠辘辘。一切如雾中树梢模糊远去，只记得开学伊始，台

上僂论，台下私语，翻飞于唇齿而充盈于耳轮的，时常不外“两杆子”也。而“政法专业”非他，就是“枪杆子刀把子”的养成之所。情形好像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也不乏青春面庞聆训之际油然而转趋庄严，实则一种未启蒙状态，一幅前现代的愚稚与冥晦图卷。幸有时代大潮荡涤，众生脱魅，放歌只为悦己；也有终生蒙垢，理性沉睡不彰，不幸而为那个时代的永恒人质。今日龃龉雷电，原来引信早已埋伏于当年，如同今日种下的果苗，等待的是明天的采摘者。

是啊，少年的心灵如同白纸，两相注视，目光灼灼，那话语的真理性遂仿佛不证自明，将一抹墨汁横泼向惨白。不，不是真理性的光华烂漫，毋宁，其所裹挟而来的是居高临下的阴刻威慑，其欲昭显的是随时启动而肆意碾压一切的无边势能。

诡异而又正常不过的是，一晃眼变成了中老年，总以玫瑰色彩描摹当年校园起居，而实为终究抗不过人类心理的专横与狡黠罢了。这一心理机制经由一番隐蔽清理后，令一切青春回忆只剩下“美好”二字。结果，意识敌不过无意识，如同理性总是激情的手下败将，真理见了谬误只能丢盔弃甲。而且，后来的一厢情愿映照的实为当年的懵懂怔忡。而它们如同暮秋的最后一片落叶，在一切梦幻皆已破灭后，那一叶梦幻碎片终于疲惫飘零，落地无声，残忍宣告人生如歌，但长旅已到尽头。此时此刻，爱恨成尘，微不足道，唯有风过长空。月浸栏杆，梦随残雨，叫我们懂得谦卑和怜悯，才堪护卫苍生，也才能慰藉残生，而适足以支撑起哀乐人生。古往今来，此为永恒常识，普世无外，虽然我们时常遗忘，总是遗忘。那少年颠沛，青春无着，晚来回首，一曲危弦，空山行尽，才有创巨痛深而又一派苍茫茫寥廓也！

话题收回来。“两杆子论”陈述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奥义，也是刀光剑影后坐享福禄寿的秘诀。其之诉诸霸道，赤裸裸，一如其之巧言令色，恬不知耻。一文一武，张弛之间，而天下底定，真正是恩仇立现，血肉翻飞。过往百年，吾族吾民，亿万性命葬身泥涂，血水让海水涨潮，早以浩瀚无辜为此悚然作证矣。

吴头楚尾，斗转星移，这杆子那杆子，都拗不过肚子与面子。因而，吃饭穿衣，这一永恒的人类窘迫，温饱则易忽，匮乏反豁显，遂终为首要问题，毕竟是首要问题，而永远是首要问题。却原来，饥饿——如名人名言的点拨——是人类的第一政治属性。是啊，吃饭要钱买，没钱没饭吃，金玉满堂才能山珍海味；穿衣要花钱，无钱无衣穿，大富大贵方始穿金戴银。升斗小民，胼手胝足，终生挣扎，面朝黄土背朝天，所求不过温饱。要是连此也犯忌，乃至三餐不济，洒家没法活，则只能拼死相搏。

可世道就是不公，人间从来不义，那峨冠博带鲜廉寡耻，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其奈也何！更为了兑现一己雄心梦幻，不惜以人间为炼狱，而用苍生为刍狗，其奈也何！其奈也何！

怎么办？咋个整？于是，古今之际，中西之间，政道转圜矣，治道损益矣，两张“票子”出矣。

一是钞票。手上有钱，心里不慌，此为人情之常，也是世道庸常。钱多钱少，端看造化，要在公正。无此造化，则钱缘浅薄，瞎折腾没用；没公正，累死亦枉然，而且，贫富皆无保障。故尔，生民

嗷嗷，多少有点儿散银糊口，好歹活下去，才是人间正道，这人间也才堪生聚。至于普罗大众居然温饱无虞，少数凤麟甚至至于饕餮无度，实为晚近方始出现的局部人类景观，一种市民生态与社会生物情态，而统辖于特定政治经济学框架。其间转折，不仅是科技助力，更在于自由经济放飞人生，催发想象，令财富涌流，而以底线公正保驾护航也。不过，纵使如此，也没能改变全体人类依旧在为吃饭穿衣而凄凄惶惶这一基本事实，一切的劳心劳力终究只具有生存论意义这一残酷现实。此不惟生存论判断，也是判断力的澎湃批判所向。而且，尤有甚者，幸有此心智与灵性，肉体跃升为身体，生存转化为存在，生死不只是轮回而获得了超越意义。

二是选票。随钞票联袂而来，伴钞票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叫做选票的纸片片儿。一纸干钧，就在于人是群居动物，虽说须臾不可分离，却又形同刺猬，则进退出处之和平共处，是仅次于饥饿的天性本然，从而蔚为生命之性命，性命之天命。学术修辞，此即政治，邦国之头等大事。政治是人性，如同人性就是历史性，而历史性生发缠绕于食色二字。就是说，政治生发于人类面对众兽只好群居、可自家内部却又永远勾心斗角离心离德之不得不然，则如何群居，不至因进退失据、出处无常而自相残杀，把这个物种灭了，这才有所然而然，求其然而有所然。因而，如同在下之再三致意，政治不是别的，就是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也是一种共同体的和平技艺。其所维持的是人间的生存底线，一种关于洒扫应对的秩序大框架，而为这个叫做人世的活色生香万丈红尘兜底儿。历经顿挫，海浪天风，漫漫试错进程中，政治终于翻转出自己的古今之别，告别武力和血腥，于无奈中实现了亿万生民经由票决参与政治、自主选择群居社区物业这一和平机制。至此，塞漠海疆，石破天惊，手上持有纸片片儿的这些芸芸众生，终于在文明诞生数万年后，完成了自己就是主权者与立法者的自我加冕。

看官，时轮至此，两张“票子”终于取代了两根“杆子”，驯化了不可一世的公权，开启了人类群居于政治共同体之内永久和平的生存模式，呀嘞哟，呼儿嗨哟，乖乖隆地咚！

其间辗转，说来很复杂，而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钞票，衣食无着，活不下去，造反遂成选项；没有选票，纵使衣食无忧，则实腹弱智，终究难以为继。更不用说亿万万人于蛋糕切割无庸置喙，而窃国者侯，数年经营，一朝糟尽，最后肯定连饭也吃不上。从沈三万到胡雪岩，再到盛宣怀，就连这些个儿光灿灿的红顶商人，亦无善终，早已对此证之再再。反之，光有钞票，吃肉骂娘；只有选票，乞丐民主。衣食无忧，选票行情平平；选票看涨，必因温饱不再，而与衣食挂钩。换言之，两票联袂，其间巧妙在于，一旦政治走不通，好歹走钞票开道的民生之道，以求暂时偏安，再求政道转圜；民生遭殃，则用选票换人，启动民主这一纠错装置，也是纾解紧张的万能出气孔。因而，良政善治，为万全计，必得两票俱全，方始左右呼应，隔山打牛，而身心康泰也。

而更为重要的在于，由此钞票冲决了权力的天罗地网，自身亦且变为一种权力，而成抗衡之势。只要权力之间有所抗衡，则社会空间增大，万众便好栖息。从而，原本属于权力一维架构下的垄断性物品与享受，只要有票子，人人皆可拥有，你能拿老子怎么着。与此同时，口袋是否有钱，钱多钱少，

取决于国家经济成长及其政治与法治保障，反过来构成了拷问政治合法性的绩效之维，要求后者有效回应，不可懈怠，进一步规训着权力的运作和政治的指向。就此而言，“笨蛋，经济，问题在于经济！”可谓现代政治的不二法门，也是现代立国之道。其间，政治自由的产权意义与获得法制保障的产权之于政治自由的基础性，交缠纠结，互为犄角。至于由此而下，如何防范权钱勾结坐大与裙带资本统治，则需引入表达自由、公民社会与独立司法诸项，于丁一卯二的配置中实现有效制衡，表现的恰恰是两张票子的现代开放治理效应。

朋友，此在功利立论，终究皮毛。两张票子登场，一张都不能缺，说到底，就在于人类这个物种，不仅要吃饱穿暖，而且，还要“收拾精神，自做主宰”。所谓生死获得了超越意义，则稟赋此种道德紧张的性灵灵，灿烂道尽几希。此非“遁世隐居”的“帝力于我何由哉”，亦非“远离尘嚣”的“篇诗斗酒自逍遥”，更非“独善其身”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凡此非他，一种私性生存，也是一种诗性烂漫，彰显的是非政治与前政治状态，而非公共生存与公共状态，终究不过如西哲所言，是一种“困在陷阱中的远足”。而人类共同体的群居本性先天地决定了人类必得生存于公共状态，以公共生存护卫一己身家。而政治，正是政治，使我们摆脱自然状态，缔造和维护公共生存与公共状态。故尔，只有造就政治及其和平共处的群居智慧，庶几乎人类方始有望真做主宰。生死之际，灵肉两头，惶惶于此岸与彼岸，我们幸有善恶一体原是不得已的自明，而于自觉人性浩瀚灿烂的同时更为人性的卑污龌龊而暗自神伤。此时此际，德性提撕固为选项，但底线防范更为重要。于是而有法治及其法制，由此不得已动用政治及其政制。迄而至今，政治依旧是世间最高智慧，玩不好，人头滚滚，玩好了，纸片片儿一张嘛。放眼一望，这个地球上，所谓“发达国家”，所谓“高阶文明”，哪个不是练就这套现代政治智慧的国族，呼应着人性的神明与卑污，而两票齐全，手舞足蹈也。

职是之故，看官，你要说这钞票与选票，也是没法子的法子，也不是个好东西，我也承认。可问题在于，人类首先就不是个好东西，极少数根本就不是个东西。你看这个地球上，最为残暴而贪婪卑鄙的物种，还不就是咱这叫做人类的两足直行的衣冠禽兽嘛！正因为此，这才有权力与围绕权力打转的政治登场，而它们不过因应人性善恶一体俱来的必要之恶，若非两张票子绑缚，更且不堪设想，则票子得谓无益？则票子何其无辜？当今华夏，钞票已然登场，其乐融融，但根基未稳，惟愿公平如滔滔江水；选票尚未路面，终究可能人手一张，但求正义如冬阳普照。如此这般，左支右应，架漏牵补，庶几乎平安无事，甚至于万事大吉也。

诸君，说是“万事大吉”，就在于就现代立国所涉之主权与治权、政权与政府等大经大法而言，经此一役，政权永固，牢系于人民主权之颠扑不破，从此永无政权危机。而政府执掌治权，授受于主权，所需斟酌的是公共政策，凭借的是立基于宪政的法制，而适成法治，于人民票决的周期性授权中兑现主权承诺。也正是藉此周期性授权，方能化解可能随时浮现的政府危机，实现政治对于政制的调控与转圜也。借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一名人名言，看官，这才是真正的两手，而左右开

弓、左右逢源矣。

上述文字系就国家政治而言。若在国家间政治与全球政治立论，则国防武备不可松懈，文教作育更是国族生聚畅达之道，而要害在于放飞心灵，让精神开敞嘹亮。有此精神内质支撑，并光大为文明气象，方始有望造就所谓大国昌盛。否则，纵有繁华，不见精神，亦难持久。此于小国自是天则，其于大国则为责任，而首先是一种自律。自律才是自爱，也才会获得他爱。再者，武备旨在和平，文教涵养人生，若无内政上合众群居的永久和平与推己及人的普世仁爱，则其势愈大，为祸愈烈。四邻忧惧，一如国民恐惧，这日子便没法过了。由此可见，国族政治与全球政治交缠，大国愈甚，而责任与标格更高，只能惟谨惟慎，而首先必得内政修明，以生民为青天，方能秀外慧中，有所然矣。若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自此起步，设身处地，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矣！否则，眼看你自己锦衣玉食，却恶待自家苍生，谁跟你同一命运？！

过往六年，每年阳历元月之初，天则做东，邀众聚议，评鹭当下，畅想未来，致意新岁，以为“新年期许”。其意在展示汉语学思智力，其义在积聚华夏精神心力，其功必有助于旧邦新命之国力。所虑所盼，不外万众共和之良政善治；积劳积慧，正在于旧邦新命之文教风华。不意今年风寒，仗马寒蝉，万众诺诺，没奈何，乃改为书面发言。在下校园漫步，斗室枯坐，以文会友，而有上述文字，拉杂絮叨，仿佛哑然作声，俨如戴镣舞蹈，好一幅颠蹶世相也！

2019年1月26日于清华无斋，2月10日修订

[【返回目录】](#)

盛洪：我的新年期许 —— 回归古典文明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这里所说“文明”，不是指现代文明，而是指古典文明，可特指为轴心时代形成的文明。现代文明不是比古典文明更“先进”，更“高明”吗？为什么要回归古典文明？

古典文明发端于人文之初，当人类从野蛮中醒来，用智慧点亮的眼睛，看到数万年自己无意识行动的因与果，悟出了最朴素的文明原则，它简单又基本。摩西说，“不可杀人”；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陀说，“无有定法”；刘邦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这些文明原则是基础且普适的人间规则，又浅显明白易于实行，从而造就了人类辉煌的古典文明。正是这些文明原则的成功，又带来了对它们的崇敬、发展和借用。为了理解文明经典，后世有许多对经典的解读，其中不少是很成功的，但同时又给曲解经典、甚至偷运私货留下了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文明原则被裹在华丽的文藻之中，繁复的宗教仪式之内，使人们看不清原本的文明原则，更迷失在自命高玄的“理论”之中。

当人们迷路时，最好的方法是回到起点，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时时温习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明原则。人类近世的灾难远远大于人类以往的历史，正是偏离古典的文明原则所致。更有以崇拜圣人之名，行

敛财之实，将善男信女追求天道之心，陷于侥幸迷信之途。因此，拨开迷雾，回归本源，就是最简单明了的答案。

有人问，古典文明岂能优于现代文明？答曰，古典文明之所以优于现代文明，是因为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文明。如果现代文明有着最优越的文明表现，就是因为它植根于古典文明原则；如果现代文明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之灾难，那一定是偏离了古典文明。反过来，我们不能证明，古典文明的优越表现是源自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也不敢保证，从现代文明能发展出古典文明。

古典文明原则其实又是人类文明的底线。现代人又有可能用“现代的方法”把它突破。如“不可杀人”，现代人可以编出“民族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杀人理由；对于“上善若水”，现代人可以“利维坦”加以颠覆；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现代人可以“阶级斗争”对之；对于“无有定法”，现代人可以“计划经济”和“法条汇编”违背；对于“伤人及盗抵罪”，现代人可以“依法履职”免责；……对于这些，我们定心凝神，以回归古典文明的方法以坚守文明底线。否则，我们就不是文明。

古典文明也展现了最简朴和无修饰的美。人们举止端庄，文辞优雅。《诗经》，《旧约》之《诗篇》、《雅歌》，希腊戏剧，《摩诃婆罗多》等，仍是今天无法逾越的美的极致。记得何怀宏说，即使周人一无是处，至少还有一点可为自己辩护，那就是他们优雅。国家间外交，多是诗词应答；甚至两国交战，也先用《诗经》过招。相形之下，我们今天自鸣得意的粗鄙言行，哪能不自惭形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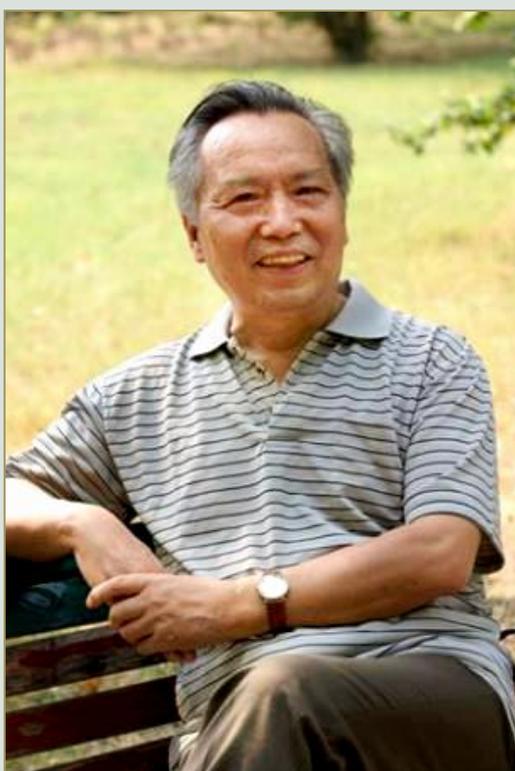
回归文明，就是对突破文明底线的担心；回归文明，就是捍卫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是文明人的条件；回归文明，就是打破所有自称“高明玄奥”理论的简明方法；回归文明，就是重新优雅地生活。■

2019年1月26日于五木书斋

[【返回目录】](#)

张曙光：法治乃立国之基，诚信乃做人之本 | 从“千亿元矿权之争”谈起

[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撰写的天则所|中评周刊 2019「新年期许」论坛专稿，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张曙光教授

1、案情经过

2003 年，陕西省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与陕西省地矿局西安地质勘查院签订《陕西榆林横山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合同书》，受让方支付了合同规定费用，省国土资源厅批准（陕国土资办发【2005】65 号文）备案，合同正常履行。后来，西勘院将波罗煤矿“一女二嫁”，与另一公司“合作”，最后把该矿出卖给境外公司，获利 21 亿元。

2006 年 5 月 16 日，就探矿权纠纷，凯奇莱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高院。11 月 19 日，一审判凯奇莱胜诉，认定合作勘查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判令西勘院将探矿权转给凯奇莱。西勘院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去依法判案，却“诚邀”省政府派员来京“座谈”。2008 年 5 月 4 日，省府以【2008】54 号文（机密）致函最高法院，认为双方合作勘查合同应属无效，合作勘查与探矿权属无关，并强调最高法院若维持原判，将产生严重后果。2009 年 11 月 4 日，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在重新开庭前，省长赵永正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和 11 月 3 日两次召开省政府党组专题会，认定民事合同无效，并发文指令省和榆林工商局撤销凯奇莱公司的工商登记，严令省公安厅和榆林公安局伪造证据，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对凯奇莱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发琦立案、通缉、抓捕、审判，关押 133 天。与此同时，陕西省国土厅密发陕国土资发【2010】67 号文，撤销了五年前公开发出的【2005】65 号文。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2011 年 3 月 30 日，陕西省高院再审此案，判凯奇莱败诉。



凯奇莱的老板、法人代表**赵发琦**

败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官司又回到最高法院。2013 年 6 月 25 日开庭后，陕西高院副院长曹建国专程来京，转达赵永正书记的意见，并代表省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务必按照陕西省委的意思判决此案”。于是，早该结案的官司又拖延了 3 年。2016 年，曹建国再次衔命来京重申省政府的要求，原定的开庭计划再次被取消。

界面新闻报道，2017 年底，最高法院判决凯奇莱与西勘院的合同有效，凯奇莱一方胜诉。法官王林清是本案的承办人，2018 年 12 月 30 日，一则王林清的自述网上流传。自述说，他作为陕北矿权案的承办人，在准备写判决书时发现，原存于自己办公室的案卷，“一审案卷都在，而二审的一本正卷和一本副卷竟不翼而飞”。他立即向法院民一庭长报告，庭长调阅监控探头，两个监控探头被黑。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在发生案卷丢失的两年中，有关单位未对此事进行报案，也未开展内部调查，更未对任何人进行查处，案卷至今仍无下落。王林清在自述中称，“我想通过这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些证据”。

在此之前，崔永元在微博上举报，该案卷宗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办公室丢失，引发舆论关注。2008 年 12 月 27 日，最高法院发布声明，该案二审全部卷宗完整保存在最高法院档案处，至王林清视频流传的前一晚，最高法院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启动调查程序。

以上就是这桩千亿元矿权案案情的大致经过。



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的爆料人、
中央电视台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2013 年底辞职

2、家乡蒙羞

此案发生在我的家乡陕西，而轰动全国。这不是家乡的光荣，而是家乡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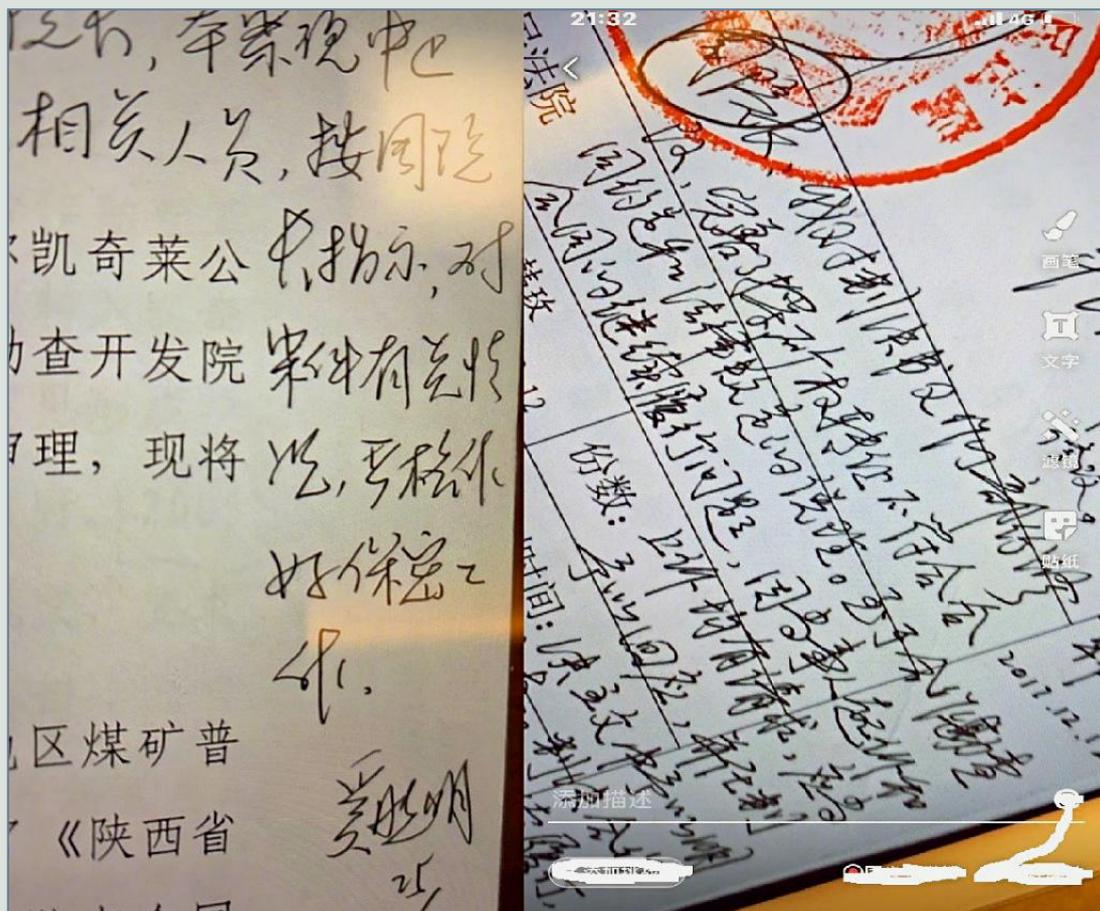
国人乡土观念较浓，年长的人更是如此。笔者今年整整 80 岁，大学毕业离家来京已经 56 个年头，但提起家乡，仍然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对家乡的进步，父老的安泰，高兴不已，对故园的不公，乡亲的不幸，无不担忧。因为，家乡有儿时美好的记忆，有学习成长的足迹，有祖坟宗庙祠堂，有挥之不去的乡愁。因此，去年末看到此案再演案卷丢失的闹剧，就不免愤慨！

陕西地处中国大地圆点，八百里秦川，陕南赛江南，陕北多矿产，而在历史上，又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曾有 12 个王朝建都西安。改革开放以来，陕西面貌大变，主要表现在生产建设和物质条件方面。别的不说，秦岭隧道的开通，贯通全省南北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关中地区城市群的城铁，与我上中学时步行 50 里回家，或只能乘坐马车相比，的确恍如隔世，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陕西发生的像千亿矿权案之类的胡作非为的事情，也不胜枚举。如，延长油田事件，国有延长油田打不出油来，无法维持，于是省政府发布文件，做出决策，让老百姓集资挖矿找油。一大批油老板信以为真，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打出油来，省政府背信弃义，一纸公文，要收归国有；如有不从，即行抓捕、监禁，不少油老板带着脚镣手铐，在政府收回油田的“协议书”上签字。此情此景，不寒而栗！老百姓的发财梦，变成一腔血和泪。

最近，陕西又出了一件离奇的事。大小官员和富豪违法占地，在秦岭风景区盖了成百上千家别墅，

多么威风，多么气魄！成为陕西贪腐的标志和象征。谁知，中央下令拆除，很多豪宅无人认领，当年抢建的勇气全无。



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疑直接干预司法的证据曝光，近日再爆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等人干预司法的罪证，崔永元称此案“最大的黑洞还不是丢卷，是先有判决书后才有开庭审理”

陕西一些官员在欺压百姓上可谓心狠手辣，在拍马媚上上却非常在行，不落人后，搞什么“梁家河大学问”，而且作为全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工程。

总之，家乡发生的一切，令父老乡亲蒙冤，令在外游子寒心，也令世人耻笑。

3、诚信荡然

千亿矿权案的首要问题是合同守信问题。西勘院是一家国有事业单位，既然签订了合同，收取了合同价款，并且批准备案，就应当守信履约。但在有关官员的唆使下，却与他人另行签约，“一女二嫁”。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居然也能脸不红、心不跳，唐而皇之的招摇过市。当一审法院判其败诉之后，西勘院不是知错认错，改邪归正，反而在省府高官的唆使下，强词夺理，赖账反诉，上告最高法院，第二次把诚信踩在脚下。陕西省地矿局也在压力之下，放弃正确立场，密密收回原先公开出台的批准备案文件，当众造假说谎，自己打自己的嘴吧，把诚信抛到脑后。至于那些迷信权力的官员，

以为权力万能，诚信顶个屁用。一朝大权在握，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自然不在话下。以至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栽赃陷害，强令公安机关抓捕关押，致受害人于死地。



美国商务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宣布，
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
此禁令为期长达 7 年，直到 2025 年 3 月 13 日

多少年来，诚信始终是国人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使人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

一是中兴去年被美国处罚，不仅罚款 10 多亿美元，而且全部领导班子更换，同时美国派员驻厂监督执行，真是一败涂地，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为何来？也是不守信义的结果。既然签约承诺从美国买来的设备不能转卖给伊朗，而中兴唯利是图，明知故犯，偏要把从美进口的设备转卖伊朗。被人家抓住狐狸尾巴认栽以后，又承诺要解雇有关人员，但碍于官场关系网和潜规则，又继续雇用在美的人员。于是被美国中断交易，造成企业无法生存，不得不再次认错挨罚。真是欠揍！然而，中兴的决策者们不思悔改，在不得不下台时以英雄般的凯旋谢幕，不少人还报以掌声。可悲啊！他们把诚信弃作敝履，而失信违约还给予鼓励。诚信何以能立？

二是最近的华为事件。笔者一直把华为看作国人的骄傲，把任正非为代表的华为人看作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本人也是一个力挺华为的铁杆。想当年，思科在美国法院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应华为之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 2003 年 2 月 17 日在京举行知识产权讨论会，讨论思科诉华为一案。笔者以《从不构成侵权的侵权到中国第一反垄断案----对思科诉华为一案的评论》为题发言，并在 23 日将发言整理成五、六千字的长篇评论发表。该文主张，华应当坚持尊重知识产权的原则立场，并从知识产权的三大要素、思科私有协议的性质和思科利用私有协议人为制造垄断，以及思科违反《中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华为应反诉思科在我国进行倾销和垄断，“逼使思科撤销在美国的官司，双方在庭外和解”。当然，笔者的评论能起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也许没有什么作用，然而此案却像评论预期的那样，后来双方达成妥协。



2019年1月29日，美国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宣布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起刑事诉讼，
指控该公司窃取美国技术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以及窃取运营商 T-Mobile US 的知识产权

但是，这一次美国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列有 23 条罪状，笔者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也发生了动摇。任正非的多次表态义正辞严，华为遵守了所有有关国家包括美国的法律，但从美国已经披露的材料看，华为不仅犯了和中兴同样不守信用的错误，只是中兴比较“笨”，一切都是自己干，华为比较“聪明”，搞了个白手套公司 Skycom 挡在前面，而且还有“欺诈金融机构”，2012-2014 年窃取 T-Mobile 美国分公司商业秘密等罪行。很明显，这一次却没有思科诉华为那样简单。不少国人义愤填膺，从政治立场和爱国主义出发，要与美国抗衡到底，外交部发言人也持如此立场，其实都于事无补。现在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美国不是中国，谁也干预不了司法，包括总统和国会。华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聘请最好的律师去打这场官司。如果赢了这场官司，华为也就创造了历史奇迹，一家商业公司竟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如果输掉这场官司，任正非的表态彻底破产，成为当代最大的骗子之一，华为也就一落千丈。总之，人命关天，背水一战，切不可掉以轻心，人们也拭目以待。

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有两大核心，一曰仁，二曰诚；仁者爱人，诚信为本。但后儒一向只强调仁，而忽视诚。不仅如此，在阶级斗争路线下，既不讲人性，又批判人道主义，以至人变成了狼，文革就是证明。至于诚信为本，早已被坑蒙拐骗所替代，现在还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

西，连历史事实都可明目张胆地篡改。仁爱诚信的传统在我们这里还有多少？现在又一次面临着生死考验。

4、法治何在？

陕北矿权纠纷案本是一件民事案件，案情也不复杂，如果依法审判，不节外生枝，很容易解决。陕西高院一审判决就是证明，它也证明了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作用。然而，有人无事生非，有意把水搅混，以便混水摸鱼，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至一个如此简单的案件，竟然拖了15年，现在连案卷都找不着了。大概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

首先，陕西省委省政府为什么要插手此案，谁给它插手此案权力？又是根据什么，认为原合同无效？除了个人私利作祟以外，现行体制给它的权力，因为它要领导一切，掌控一切。至于根据吗？权大于法，官大于理，我说的就是根据，就是真理。所以，这些官员才如此肆无忌惮，玩法律于掌股之上。提到陕西省致最高人民法院的密函，竟大言不惭地要挟最高法院按照自己的意思判案，其所提出的三条理由（最高院若维持原判，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对煤矿开发正常秩序造成混乱；二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三是不利于陕西省委省政府对煤炭资源“三个转化”的落实，将对发陈胜和稳定大局带来消极影响），都是政治口号，都是拿陕西老百姓作挡箭牌，与他们的行为完全相反。这些大话、空话、假话，哪一条与案情有关？这是现行官员惯用的伎俩，但居然能够左右最高法院的行为和选择。

其次，堂堂中国最高法院也不能独立判案，而要听令于一个地方诸侯。既然如此，比省长权力大的人都是高院不能违抗的上司，那么，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何在，岂不变成了官员手中的玩物和工具？既然握有最后裁决的权力，又受理了此案，就该依法独立裁决，为什么要邀请陕西的要员来京座谈？收到陕西省的要挟密函，为什么不据理驳回，而要言听计从，“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甚至按照陕西省官员的指令，三番五次地推迟开庭？真是贻笑天下！这就公开授予陕西官员无法无天，弄权弄法、草菅人命的权力，于是发生了陕西省高院再审食言枉判的闹剧，把陕西与此案有关的官员都置于不人不鬼的境地。既然官司再次打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终裁判合同有效，为什么偏偏发生案卷丢失事件？从一审案卷完好二审案卷丢失来看，明明是内部有人做贼心虚，隐瞒和销毁罪证，最高法院为什么听之任之，既不报案立案，也不作任何处理，何人在有意包庇？在有人举报以后，为什么出尔反尔，先否认案卷丢失，后又宣布立案查处？为什么最高法院一介法官也无法自保，要通过媒体发声，为自己留下“免遭不测”的保命证据，难道最高法院也黑到这种地步？堂堂国家最高法院，人们最后讲理的地方，居然成了这个样子，国人应该相信谁？人们到何申冤，到何处讲理，到何处寻求法律救济和安全保护？

再次，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发生在执政党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背景之下，不知人们作何感想？这是对两届全会决议的掌脸，是对执政党的嘲弄！原来，

中国的以法治国就是这个样子。正因为如此，远的不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内发生的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也就不难解释，山西煤炭案、广东顾维军案、浙江吴英案、湖南曾成杰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必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官场尽是潜规则，国人还要继续在这些恶法恶吏的治下生活。难道命该如此？

历史早已并不证明，法治乃立国之基，诚信乃做人之本。尽管一叶知秋，笔者还是以此作为新一年的最大期望，这“基”这“本”，能够早日在神州真正确立。 ❷

2019-02-10, 于北京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场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深入交流，对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每场小型沙龙一般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众多方面。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0年9月，「**人大代表制度创新和代表法修订**」研讨会，于《人大代表法》修订草案征集意见期间举行。参会专家包括：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郭道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3月，「**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于乌克兰政局变化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寒冰、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所长邢广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张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顾正龙、前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副社长盛世良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继续组织“云豹沙龙”年度系列研讨会。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 万元（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 ◆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 ◆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 ◆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 ◆ 会议资料编辑费
- ◆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 2019-2020 年度 1 场沙龙的完整发言稿（任选 1 场，发送到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200 元：可获得 2019-2020 年度 1 场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任选 1 场，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支持 400 元：可获得 2019-2020 年度 5 场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到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 2019-2020 年度 5 场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场沙龙仅一位）：成为一场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可以共同协商决定该期沙龙的选题；可以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同享有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以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同享有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以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成为 2019-2020 年度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可以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同享有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以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

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9-2020 年度举办的沙龙不足 5 场，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顺延至 2018-2019 年度的沙龙场次之中。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